

社会支持网面临重构

中国社会科学院“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”课题组 课题主持人 李培林 本文执笔人 刁鹏飞 李培林审改

在当前自然灾害多发、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，社会支持网的建设显得更加重要。了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城乡居民获得的各种支持来源的现状，分析其发展变动的趋势，探索构筑新型社会支持网的途径，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8年5-9月，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式，开展了第二次“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”(GSS2008, CASS)，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的134个县(市、区)、251个乡镇、街道和523个村(居委会)，共成功入户访问了7139位年龄在18-69岁的居民，调查误差小于2%，符合统计推论的科学要求。本文根据这次调查数据，对我国社会支持情况进行了如下分析。

组织化支持在从“单位”转向“社区”

改革开放以后，社会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，就是随着社会流动的大量增加，发生了社会成员从“单位人”到“社会人”的变化。根据调查结果，当询问被访者在过去一年间曾接受过哪些组织机构的帮助时，在全部组织化支持中，由工作单位(包括自己和亲属所在单位)提供的支持只占6.3%，而社区(村委会、居委会)提供的支持占全部组织化支持的2/5强。从“单位办社会”向“社区服务社会”的这种转变，使社区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组织化支持资源的提供者。

总体来看，“单位”在整个社会的组织化支持中已不再扮演主角，以社区支持为主的多样化、社会化的支持越来越发挥主导的作用。那些在非国有单位就业的样本表明，他们的组织化支持主要来自社区，工作单位对他们的支持作用很小。传统“单位制”意义上的工作单位——机关、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——经过多年改革，单位在员工的组织化支持中占有的份额平均在22%左右。对这些机构的从业人员来讲，“单位制”弱化的部分支持，正在由社区、地方政府、党群组织、社会团体和市场化机构分担。不过，社区支持在这些员工的组织化支持中所占的份额还不足20%，低于工作单位的支持作用。可以说，虽然单位制整体上逐步被削弱，但单位内部的员工仍然保持其对单位的依赖，从单位获得工作和生活中的帮助。

公务员有较完善的制度化保障

当然，不同单位工作的人员所获得的组织化支持的来源情况也有很大差异。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分析，改革开放后新生的从业类别，如农村家庭经营、个体工商户、私营企业、“三资”企业等，从业人员更多地从社区获得支持(社区支持所占比例基本都在40%以上)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传统意义上的正式工作“单位”中，如国有和集体企业、国有和集体事业单位等，员工仍然是得到“单位”的支持多于得到“社区”的支持。党政机关这一类较为特殊，他们依靠社区支持的比例在各类工作部门中是最低的，但同时也不存在对单位的依赖。可能的解释是，公务员制度的实行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化保障，形成了有别于过去“单位支持”和现在“社区支持”的国家保障制度的支持。

收入与组织化支持负相关

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分析，家庭人均收入与组织化支持的数量呈负相关关系。家庭收入越低，获得组织化支持的数量就越高(Pearson $r = -0.057$)。通过把家庭人均收入五等分组，比较各组之间的组织化支持数量，结果显示收入与组织化支持成负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：家庭人均收入最低的20%人群，他们得到的组织化支持数量显著多于其他收入组。除了最低家庭人均收入组之外，其他四个收入组相互之间在组织化支持数量上差别不大。收入分组资料显示，组织化支持

的对象向低收入人群倾斜。

另外，家庭人均收入分组与个体化支持数量之间也表现出负相关关系。最低收入的 20% 样本中，得到的个体化支持数量显著多于其他四个收入组。除了最低收入组之外，其他四个收入组之间在个体化支持在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。这样，我们看到个体化和组织化的支持资源，均偏重于最低收入的 20% 人群。

社会支持网过多地依赖私人关系

根据调查结果，过去一年接受过其他个体较大帮助的被访者占样本总量的 38.5%，远远超过组织化支持的覆盖面，转型期的人们更多依靠私人关系获得支持。在得到过个体化支持的被访者中间，仅得到 1 个人支持的占 40.2%，得到过 2 个人及以上个体支持的被访者接近 60%。调查发现，个人支持网是由亲属主导的、频繁联系的人组成的小规模的紧密网络，其中绝大多数(93%的支持者)是被访者最为熟悉的人。但维系一个熟人的关系网络，成本也在不断增加。调查显示，家庭用于人情往来的消费与个体化支持的数量之间成显著正相关。被访者获得个体化支持的数量越多，则家庭用于人情往来的消费也越高(Pearson $r=0.038^{**}$)。人情支出大已经成为居民生活中的负担，特别是在农村，人情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甚高。我们进一步分析人情支出费用与“人情支出大”的压力之间的关系，结果显示，人们用于人情的开销占家庭总支出比例越大，造成人情支出的压力也越大(Pearson $r=0.265$)。

以城乡居民的个体化支持为例，略作说明。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维系的个体支持网规模大，人情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高，进而导致“人情支出大”的压力水平比城市高。本来个体支持网具备灵活性高、成本低特征，能够发挥贴近需求、支持及时的积极作用，然而对个体支持网的过度依赖，反而造成了社会支持的家庭成本过高。

城乡居民支持网存在明显差异

调查结果显示，在城乡居民之间，无论是在个体支持方面还是在组织支持方面，支持网的特点都有明显差异。城乡组织支持网的相似之处在于，一是支持数量没有显著差异，二是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，首要的组织支持都来自社区(村委会、居委会)，分别占城、乡组织化支持资源的 41.7%和 43.3%；排在第二位的也都是地方政府部门，分别占城、乡组织化支持资源的 22.4%和 30.4%。城乡之间组织支持的差异表现在，城市居民较之农村居民更多地依赖党群组织和工作单位，而农村居民较之城镇居民则更多地依赖市场化机构和社会团体等。

与城市相比，农村缺少工作单位这条组织化支持的渠道，党群组织也不如城市那样发达。数据显示，工作单位和党群组织在乡村的组织化支持中仅占 1.8%和 6.7%；而城市中工作单位和党群组织的作用远高于乡村，分别提供 10.2%和 15.0%的组织化支持。乡村在支持来源的市场化上，以银行(信用社)为主的商业化机构，提供了 8.5%的组织化支持，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城市。在乡村，以专业协会、行会为主的民间社会团体，提供社会化支持的比例也略高于城市。